

从传统到现代

金耀基 著



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从传统到现代

金耀基 著



法律出版社

始创于1954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传统到现代. 卷1/金耀基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36 - 9321 - 2

I. ①从… II. ①金…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8573 号

从传统到现代(卷一)

金耀基 著

策划编辑 高山

责任编辑 高山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A5

版本/2010年8月第1版

出版/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印张/5.75 字数/97千

印次/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编辑统筹/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036 - 9321 - 2

定价:36.00元(全二卷)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从传统到现代

《从传统到现代》增订版序

中国 1978 年的改革与开放,是 1949 年以来中共在国家社会发展上一次范典的转换。中国因“改革”而走上“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因“开放”而进入全球化的巨流。自 1978 年起,党内党外的有识之士,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痛定思痛,突破社会主义的教条框框,展现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认清绝对贫穷,绝对落后的中国现实,把经济现代化作为改革的中心,并赋予“发展生产力”以理论的高度与位置。三十年来,从摸着石头过河跌跌撞撞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生产力在新制度下,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国民总生产值长年达百分之九的成长率,经济规模每八年增加一倍,为世界经济史前未之见。此一时期,有近四亿人摆脱了贫穷,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进入中产阶层,今天中国一天的出口就超过 1978 年全年的出口总额。我们知道,产业革命全盛时期,英国号称“世界工厂”,而今这个称号属于中国,就经济总体力而言,中国仅

居美国之后,而与日本处于竞鞭争居第二的位置了。在全球权势地图上,中国百年来从“天朝上国”直滑落到世界“边陲”,而今再从边陲回到世界一个中心(全球的多元中心格局)的位置,无怪乎国内外“中国崛起”之声不绝于耳也。

观乎中国近十五年来,在生产力革命的高涨中,亦出现了一个静悄悄的消费革命,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急剧展开: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讯息化一一涌现,从人们思想习惯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无不一一在改变中,在一切变迁中,固然也发生了种种大大小小的风险与问题,甚至跌落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陷阱的边沿而难于振拨(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又如环境与生态的危机),但整体的发展轨迹显示了一个“传统性”社会快步转向一个“现代性”社会的形态。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社会转型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也即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高点。

我在台湾最早出版的《从传统到现代》,是在1966年,而就在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反理性、反现代化的运动,所以,《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也只在台湾与香港与读者见面。但1978年中国大陆重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轨道之时,《从传统到现代》就陆续在大陆内地问世了,不过,当时流行的几个版本都没有我的授权,1999年我才正式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匆匆已逾十年,且早已绝市。年前法律出版社的高山先生来港看我,表示希望为《从传统到现代》出一新版。高山先生于2008年曾出版我的少作《中国民本思想史》(1964年台

湾初版),神交已有一段时日,见面畅谈,诚为快事。高山先生对出版事业那一份严肃、热情与见识,令我欣赏钦佩。我不仅乐于授权他出版《从传统到现代》,并且决定出一个“增订版”。这个增订版,分为二卷,卷一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原样文本。卷二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补篇》。这个《补篇》收入的十篇文字,五篇是取自我的《中国现代化与知识份子》一书。此书多篇文字都是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与《从传统到现代》同时或稍晚发表,可视为《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之姊妹作。《补篇》中有二篇,((再论《从传统到现代》)及《中国现代化之动向——一些观察与反省》)则是我对七十年代一些对《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质疑与批评的回应与自我检视。整体来说,《补篇》是我对中国现代化及其相关的议题与问题的讨论与诠释,(如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途径,价值在现代化中之定位等),它们是《从传统到现代》中没有触及或讨论不足者,故可说是一种补充。而今这个“增订本”,基本上是《从传统到现代》与《中国现代化与知识份子》二书合而为一,使我对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与看法,有一个较全面与完整的展现。

《从传统到现代》第一版于1966年在台湾问世,《从传统到现代》的“增订版”于2010年在大陆出版,前后44年,从台湾到大陆,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此实书之幸事。诚然,原书论述之对象是台湾,但我心中是文化之中国,民族之中国。中国大陆的读者读此书应不会感到陌生与隔阂,特别是今天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三个中国人的社会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历史中,都处于现代化的不同坐标上,也都正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过程中。读

者读此书当能有更多意会或在心中与此书论点产生对话。所应特意指出者,中国的现代化旨在建立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惟中国现代性之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之富强,中国现代性之建构,讲到底,是在求建立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涵盖的不止是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秩序,也包括伦理的、政治的、学术的与生态的秩序。迄至今日,在不同领域中,有的已有显著成绩;有的尚待完善化;有的则问题重重;有的则仍在起步阶段。显然,建构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是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历二十世纪,中国人未竟之业,它仍是有待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继续探索,继续努力去完成的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大业。

《从传统到现代》的“增订版”的出版,正是希望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之历史大业,有所助益耳,是为序。

金耀基

2010年3月3日于香港

1999 年简体字版自序

书的际遇与命运往往是独立于作者的。《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的际遇与命运就不是我撰写时所能见到的。至少,在 33 年前此书付梓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在大陆问世,说实在的,过去三分之一世纪中国的变化是太大了。

1966 年我在台湾出版《从传统到现代》,而就在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很容易看到我出此书的用心所在与心中愿景,一句话,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个反现代化运动。诚然,当时,台湾与大陆完全处于隔绝的状况,我写书时对正在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了一无所知,不过,读者可以发现,我心中的中国是文化的中国、民族的中国,以此,台湾与大陆在我的书中是不分的,当我讨论到“巨变中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时,我的论述的对象实际上是台湾,

我想象中的读者主要是与大陆同文同种的在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

在过去 33 年中,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已相当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跃进为一新兴的工业体系,并已初步地踏进现代社会之林了,而大陆于 1978 年之后,亦积极推动现代化,并取得了骄人成绩,至于香港在过去 30 年中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现代化中。我几乎亲身目睹香港由一个殖民统治下的城市转化为一现代化的国际都会,简言之,中国的三个社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落在现代化的坐标上,只是有者走得早,有者走得迟,这对于一个以中国现代化为“理性宗教”的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鼓舞。这三十多年来,《从传统到现代》使我得到无数知音,但也遭到许多善意与不善意的批评,甚至不少恶毒的咒骂。

现在,《从传统到现代》正式要在大陆以简体字版与读者见面了。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向我提出这个出版构思时,我确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本可算是我的“少作”的书在 21 世纪的前夕再在大陆出版有无意义与价值?我思量的结果是,还是让它与大陆的读者见面吧!这是它的命运。虽然此书出版已久,里面有许多地方,不但写得粗糙,而且颇有滋疑,但是它毕竟是第一本有系统地用社会科学知识论述中国现代化的中文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鼓吹”中国现代化的书,到此刻为止,我仍然相信我在原版自序上的话:

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

我应该指出,在台湾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更应承认,我当年“鼓吹”现代化时,的确是过于乐观的,并且对现代化理论是缺少应有的“批判性的反省”的。70年代以还,西方自法兰克福学派导引而起的“现代批判”(critique of modernity)也移植到台湾,因而对台湾的现代化和对我的现代化论产生严厉的抨击,不可否认,其间不少是具有严肃反思智慧的(杭之1987年的《一苇集:现代发展的反省断片》是一例),但有许多反现代化论调则多是无根的游谈,对台湾现代化的发展了无裨益。在西方,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讨论在80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出现了所谓“现代性论辩”。这是较复杂的课题,我在他处已有所论述。简言之,80年代以还西方有“现代终结”的口号出现。有各色各样批判“现代”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调,但是,在我看来“现代”是否“终结”的辩论,在西方或有一些经验的意义,而就全球而言,更有意义的显然是“全球的多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的论题,至于对中国来说,中国在21世纪最大的事业还是中国的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某些批判,或正可以使中国的现代化得以避免一些“现代性”建构中的陷阱或减轻现代化过程中的错失与伤痛。严格地说,中国

只有经过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后现代问题”。墨西哥 197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巴斯(Octavio Paz)说,墨西哥是“命定地现代化”的。他充分了解现代化对墨西哥古老文明可能造成的伤害,但他说:“现代化对墨西哥而言是惟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我要说,中国一样是“命定地现代化”的。凡是古老的文明如中国、墨西哥要在世界上立足,要在全球化的社会有新的生命、新的贡献,是不能不自觉地有一个“现代转向”的。

中国需要现代化,在今日看来,几乎是“自明之理”,但在 33 年前,当时台湾的知识气候(或者应说官方的知识气候),讲现代化虽非禁忌,却是不合时宜的,现在回头看,同时大陆正爆发“文化大革命”,自然不可能有讲现代化的声音了。对我最大的欣慰是,《从传统到现代》甫问世,台湾的知识界就给了它很热切的欢迎与回响,之后一印再印,如果销量是一个指标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它确是台湾知识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一本思想性读物。关于此书在台湾思想史的定位问题,傅大为先生 1990 年写《由台湾思想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看发言权的取代与转型:从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过渡到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一文作了一些分析。说实在的,对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评论虽然不少,但真正有力地触及此书根本性的意义与问题的则是刘小枫先生 1994 年 2 月所发表的《金耀基的“现代化”论及其问题意识》一篇严肃的评论文字(《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刘小枫对此书(及其他我的相关文字)的批评很深刻,如他指出我所建构的重点不是“现代性”而是“现代化”,又

如他指出：我“给‘现代化’注入价值论的判断和个体旨意，从而出现了现代化论中内在的‘实然’与‘应然’，价值中立与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与紧张”，他也委婉地指出我的论述并没有能恪守我自己提出的知识学原则。他更敏锐地看到我的问题“主要从文化论争中来的”，从而“出现了知识学类型从社会学向文化学的重点转移”而导致我的“‘现代化’论的问题意识的单向性”。刘小枫对《从传统到现代》的意义则亦有深获我心的论断。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心志趣向，他说：

从汉语思想学术百年经历来看，现代化论的学术效力是，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了传统人文学的论域（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化学乃至思想史），对有效地抑制文人式的社会问题言述有至今难以估量的学术意义，金先生致力于社会科学在汉语知识界的确立和扩散，抑制文人式的浮泛之论，实际促成了汉语思想学术言路的转向。

刘小枫又说：

我以为，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的学术言述是汉语现代学的先驱性理论建构。在金先生之前，涉及现代现象的汉语学家和文人的话语不胜枚举，但金先生的学术言述自觉地致力以社会科学之实证知识为工具来建构关

于现代现象的理论,即现代化理论,虽逾二十余年,至今仍有现实的学术意义,在现代汉语学术史上亦占有重要位置。

我引了刘小枫先生这两段话,恐不免有“戏台里喝彩”的意味,但坦白地说,《从传统到现代》出版 33 年,真正使我有瞿然以惊的评论就是刘小枫的这篇评论。读了他的评论,我确有“知我、罪我,其惟小枫”之感。

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这是中国人 20 世纪未竟之事,也是中国人 21 世纪最根本的大业。我诚恳地希望简体字版《从传统到现代》的新读者能够了解我写此书的心志,并以批判的眼光与此书对话。

金耀基

1999 年 10 月于香港

自序

一

19 世纪末叶,中华帝国的大门为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猛然撞开,从此,西方势力,如狂飙暴雨,一侵而入,整个中国赤裸地无力地呈露在帝国主义的利爪之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旋踵之间,神州大陆沦为了“半殖民地”的悲境,竟这不是一场恶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生长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极端的严重之秋,除非感情已麻痹,大脑已冰冻,焉能无动于衷?

百年来,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如巨浸稽天,逆泳无力,整个社会的结构面对了全面的解组,整个文化的价值面对了彻底清失的威胁。华夏文明,上国衣冠,竟沦到若有若无的凄局,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临这样一个文化绝续三千年未有的变局,除非血已凉、心已死,又焉能作太上之忘情!

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中,我们可以了解,何以自清末以还,站在第一线的中国知识分子,从郭嵩焘、严几道、梁启超、胡适之、梁漱溟诸先生以降,无不把精力心血投注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及是自救发展之道上。而作为一自觉的中国人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我,自做一个少年的学生起,就为讨论这方面的文字所吸引住了,半个年代以来,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不是日减,而是日增,甚至逐渐形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不论在求学或讲课阶段,也不论在国内或国外时期,我总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热忱。有人问我,何以对这个问题孜孜不倦,一至于此,我的答复很简单:因为这是百年来中国人最根本的问题。

二

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关切是一致的,但各人所持的观点则有极大幅度的差异,因此,乃逻辑地引起了全面的文化论争。

中国文化的论争从大学士倭仁在 1867 年给同治皇帝的奏折算起,到现在已经有 89 年的历史了。在这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论争,从用文言到用白话文,年复一年,不知白了多少人的头发,也不知耗了多少人的心血。但我们仔细检视这方面的议论,除了极少数的文字系以理智为导引,而表现出健康可敬的见解外,绝大多数则不脱情绪的牢范。尽管从清末到五四,从五四到今日,中西文化的论争表面上显得非常热闹,但粗率地从骨子里分析,则皆不能跳出国粹主义派、全盘西化派及折中主义派

三派的范畴。许多皇皇大论或辛辣刺激、或文采风流，固然一时颇能掀动人心，赢得许多喝彩之声，但如把他们的言论予以煮干，则可发现只是一些文艺性、策论性的清说与玄谈。清说与玄谈本来就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有力的传统，所以文化问题一到了他们手中，便是做文章的大好题材，尽管没有丝毫文化学方面的知识的训练作基底，却仍可神驰心游，下笔千言。他们把文化看作了一团面粉，可以使之圆，也可以使之方；可以使之短，也可以使之长。只许让文化来贴就自己的意见，而不去理解什么是文化，于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文化问题乃变成了最廉价的问题，此所以中西文化的论争始终在层层迷雾中打滚，看不到一清澈的方向。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的论战，变成了个人追逐虚声的最佳也最便捷的道路，但所提出来的见解，除极少数外，上焉者只能算是个人的“意见”，下焉者则只是“意气”而已，但都逃不出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格局。有的可以把中国文化“理想化”为一不待外求的“自足体系”；有的可以把中国文化“丑化”为一无所是的“断烂朝报”。其实，文化问题是极不好谈的，它是一个大得复杂得足以令人却步的题目，而像中西文化这样的大题目更是棘手。人类学者赖得菲尔德(R. Redfields)与辛格(M. Singer)就曾指出，即使像汤因比(T. Toynbee)、诺索普(F. S. C. Northrop)二人所陈示的观点也是不能令人满意或接受的。诚然，社会文化是一“全体系”，它的复杂的性格有一“多项的因果关系”(multi-variate causation and consequences)，因此决不能执一以概全。许多人随便捡拾古人的一个思想或现实社会的一个事实，就拿来支持他预定的假设或判断，殊不知该同一思想或